

最高检司法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依法履职保障社区矫正法统一正确实施

本报北京7月5日讯 记者张昊 7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以“贯彻落实社区矫正法 推进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和法律监督”为主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3年来检察机关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和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和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最高检第五检察厅厅长侯亚辉介绍说,社区矫正法实施3年以来,各地检察机关依法充分履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能,注重把最高检党组关于“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要求落实到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3年来,检察机关全面推进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探索实践,监督办案力度明显加强,监督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依法开展涉海涉渔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工作,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开展经营活动,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保护;依法稳妥有序开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试点,探索运用和发挥大数据监督模型优势,有力提升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质效;内外协作,提升素能,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发展。

“3年来,全国司法行政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中央政法委的要求,积极履行职责使命,采取有力措施,全力推动社区矫正法贯彻实施。”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副局长刘晖表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专门执法力量进一步壮大,社区矫正监管教育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

会上还发布了社区矫正对象李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监督案等第三批共6件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典型案例。

吹响新征程上建功立业集结号

上接第一版 牢记宗旨意识,热爱党爱国爱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提高法律服务和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律所党支部从提高政治站位角度,增强做好律所党建的自觉性。”新疆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李春雷在全所学习贯彻“五点希望”会议上提出,要同步规划律所党建及所建未来发展方向,制定符合律所发展实际的党建工作目标,不断增强律所行业党建工作实效以及专业服务能力。

四川善嘉律师事务所主任邓勇说,在实际工作中,律所要积极引导广大律师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终身职业信仰,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厚植执业为民情怀,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展现新作为。

“作为一名律所党支部书记,一定在第一时间将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律所党建工作中,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做到心中有信仰、工作有目标、行动有方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张玉华表示。

实干是实干者的通行证。

北京浩天(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浩迅速组织律所认真学习座谈会精神,畅谈学习心得体会。该律所全体律师一致表示,将积极贯彻落实“五点希望”,增强大局观念和政治站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树立公平正义、服务大局的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厚植执业为民情怀,努力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

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李凤介绍,连日来,律所党支部和管委会积极引导全所律师自觉把“五点希望”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和公益法律服务,积极参与法治宣传、法律咨询、律师调解,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法律服务的需求。

司法部党组“五点希望”中提出,律师要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对此,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主任汪政认为,律所要致力于提升律师专业素养,运用科技提升服务质量,积极服务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青年律师是律师事业的未来。

“座谈会上,司法部党组对青年律师寄予了无限的期待,我们青年律师要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不断提升法律服务创新能力,立足新时代新要求,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更大作为。”北京青联副主席、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廖海程表示。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志国说,文康律所将加强青年律师专业能力的培训与提升,并吸纳多领域青年专业人士,打造更优质、更高效、更全面的法律服务团队。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家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一致认为,“五点希望”吹响了广大律师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建功立业的集结号,为新时代律师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的活力。

施建国:心中装着群众 肩上扛着正义

上接第一版 面对此类家长里短“难断的家事”,施建国在社区警校开起了“听证会”,邀请社区干部、网格员、其他居民前来,请大家听一听,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意见后,当事人也觉得噪声扰邻不大好意思,主动维修了空调外机。

成为社区民警之前,施建国干了10年刑侦。在他妻子的眼里,施建国当社区民警这件事有些难以想象。毕竟日常生活中的他大大咧咧有些粗放,干刑侦时也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如今竟能沉下心来成为一名耐心细致的社区民警。

一名社区民警,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是他那份对警的誓言是在群众的家长里短里践行,是在脚步穿梭中证明,无论是春天的清晨还是夏天的午后,无论是深秋的傍晚还是严冬的深夜,他们始终坚持群众的小事就是头等的大事。

发动群众民力无限

“施警官,这帮人又来了,劝都劝不走。”“好的,你先接待他们,我马上过来。”这是某商业大厦保安队长微信发给施建国的图文,内容是某单位产生经济纠纷后对方来讨要说法的场景。

北山派出所每个社区配备了一名民警加两名辅警,流动人口、出租房屋消防安全、沿街商铺检查等都是日常工作的重点,然而复杂的人、事、物仅靠3个人显然难以理顺。

发动群众,建立起“星火联盟”是施建国工作的法宝之一,义警、物业、保安队长、党员志愿者等都是他的联盟成员。

保安队长发来的事件在施建国的协调下,街道、调解员、相关部门一道介入,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签署调解协议。

对于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施建国如数家珍,哪个小区居民最近对小区管理上有什么想法,哪个写字楼新来了一批员工安全防范意识需要提高,哪个商户碰到了困难需要帮助,他都清清楚楚。

施建国的辖区黄龙社区写字楼多,有大大小小300多家单位,在此工作的人学历素质相对较高,对于反诈宣传不少人都直言“施警官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

然而随着诈骗集团的活术不断升级,手

段也越发隐秘,施建国辖区内就有两名律师因为轻信“天上掉馅饼”的投资理财类诈骗损失了几十万元。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频发的状况,施建国定期邀请辖区单位人员召开反诈宣传会议,在小区、楼宇内进行“扫楼”反诈宣传。施建国还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联络员建起联络群,定时推送反诈宣传资料,诈骗案件大幅下降。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其实社区民警日常接触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一些可能我们到达现场后两句矛盾就解决了,在我们看来这些都不算什么成绩。”施建国总是这样说。

然而在施建国带的新徒弟李星熠眼里,可不是这么回事:“师傅总是很有耐心,我手上事情多了不知该从何下手时,想想师傅是怎么干的就会沉下心来慢慢去做。”

李星熠之前接到一个父亲打女儿的家暴警情,登门了解情况时发现父亲孙某态度嚣张。尚未成家,社会经验稍显不足的李星熠不知从何处介入,于是向施建国求助。

施建国上门后,面对孙某的嚣张态度,毫不退让。他明确告知孙某殴打他人是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处以拘留。

接着,施建国又从情感上劝说孙某,跟他讲自己办过案件中真实的故事,让他别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却让孩子性格产生缺陷,日后在学习工作乃至择偶中出现更多问题。这之后,李星熠再也没接到这户人家的相关警情。

“看到他努力的样子,好像又看到了自己当年刚当警察的样子。”施建国感慨道,李星熠在社区当民警之外还承担了所里的反诈宣传工作,今年3月他与辅警周凡涛自编自导的反诈短剧《满江红之反诈》在全省“平安亚运全民反诈——反诈达人秀(杭州)”公益活动中获评一等奖。

北山派出所所长风素芳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施建国与李星熠这样优秀的民警与年轻民警结成师徒对子,不仅产生了丰富经验与年轻活力间的化学反应,更助力北山派出所守好红色根脉、赓续红色基因,民警们在忠诚履职担当中写好红色家谱,守好红色阵地,当好红色传人,传承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最美“枫景”。

“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新时代回响

浙江法院创新群众路线升级诉源治理

□ 本报记者 张晨 王春

1963年,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而今,传奇故事讲了一个甲子,历久弥新。

如何创新群众路线加强基层自治?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浙江法院收案数量逐年稳步下降,诉源治理走在全国前列。统计显示,2018年浙江法院收案增幅由2017年的14.8%下降至3.4%,系10年来首次出现个数增长;2019年收案下降4.6%,系全国唯一收案下降的省份,此后逐年稳步下降,2022年收案下降10.1%,收案数从过去的全国第2位降至2022年底第8位。

这背后,是一套诉源治理的“组合拳”:2018年起分别在乡镇、县级和全省层面总结推广永康“龙山经验”、舟山“普陀模式”和“浙江解纷码”,积极推动“信访打头、调解为基、诉讼断后”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建设,构建起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最大限度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

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村民世代习武,加之地理位置处于三区交界,容易产生各种矛盾。

“村干部在调解个案纠纷过程中,遇到疑难复杂问题,只懂情理,不懂法理。”上田村党总支书记潘曙龙说,作为特邀调解员,潘曙龙的多元共治想法与临安区人民法院不谋而合,逐步演化出了共享法庭。

潘曙龙告诉记者:“有了共享法庭,我们

可以向法院提出指导调解的申请,由法官给予专业法律解答,改变以往村干部处理纠纷时只讲摆平,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困境,让村干部在调解过程中更有底气、信心更足。真正将村干部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与法官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杭州中院共享法庭建设工作专班负责人陈辽敏看来,共享法庭像一个小支点,撬动了社会治理的大格局。

从上田村出发,这一“不增编、不建房,一根网线一块屏”的机制已经推广至浙江。截至目前,浙江省已建成共享法庭2.7万个,覆盖100%的镇街,98%以上的村社,指导调解40.17万次,化解矛盾纠纷30.83万件,纠纷就地化解率为76.75%,普法宣传9.5万场464万余人次。

6月27日,《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浙江省地方标准发布,深入推动共享法庭规范化、均衡化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普惠、均等的法治服务。

在数字改革中探索整体智治模式

“杜法官,今年市场上假茶少了,我们安吉白茶更好卖了!”今年4月,春茶销售旺季,一起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向时任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杜前感慨道。

司法守护着安吉白茶,也守护着茂林修竹。审判环节已是环境资源案件的末端,如何从前端发力,从“事后解”到“事前防”,实现环境司法“治未病”,也是浙江法院逐步探索的新领域。

在湖州安吉,120名“森林法官”的身影活跃在215个行政村,他们力量下沉为的是提前介入涉林案件化解。

“‘森林法官’就是我们老百姓取的名字。”安吉县溪龙乡农业农村办公室四级调研员钱义荣说,“我一辈子跟茶叶、茶农打交道,

在这过程中跟法院接触也比较多,法院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特别是白茶季,法官还驻点在茶山、白茶交易市场提供法律服务,非常及时、方便。”

走进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这里像是一个化解纠纷版本的政务大厅。记者在立案导诉窗口碰到来办业务的本地律师裘述,他说:“我们一般希望能诉前调解,案结事了最好,共享法庭像一个小支点,撬动了社会治理的大格局。”

杜前介绍:“我们率先在全省出台人民法院参与诉调中心建设规范化指引,全市基层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建制整体入驻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在全省率先发布‘诉源治理指标体系’,将纠纷诉前调解成功率等核心指标纳入对乡镇的平安考核。”

如今,浙江省90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入驻中心,法院剥离诉前调解职能,法官不再直接参与纠纷调解,而是专注于调解指导、司法确认、诉调对接、简案速裁等工作。

2022年,全省社会治理中心接待群众113.7万人,统一受理各类信访和矛盾纠纷66.5万件,办结61.7万件,化解成功率达92.8%。

与此同时,浙江省层面大力推广“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打造“资源集聚、分层递进、智能解纷”的省域纠纷解决模式。

截至今年6月,“浙江解纷码”访问量达1545.2万人次,提供智能咨询925万次,调解案件307.9万件,调解成功率为51.1%,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在法治轨道上完善分层过滤体系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实现法治之下的

和谱和谐?

记者注意到,“党委统揽、关口前移、一站解纷”的县域纠纷解决模式体现出浙江法院在基层治理上的智慧。

近日,诸暨市新增了一个“和睦家事”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早在2021年,诸暨法院就推出婚前科普学习教育平台,帮助新人以更理性审慎的态度对待婚姻生活,从源头上减少婚姻家庭纠纷,推进家事审判方式改革。

“治理越早,化解纠纷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等越小,这显然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理念完全相同。”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刘艳认为,矛盾纠纷全生命周期治理就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位于金华永康龙山镇桥下南村的龙山人民法庭,下辖龙山、西溪两个乡镇,辖区总人口超10万人。这里经济发展起步早,市场化程度高,外来务工人员多。两名法官,一名法官助理加两名书记员,小小的法庭如何应对多发的矛盾纠纷?

龙山人民法庭主动对接乡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纠纷统一由中心指挥分流,第一道村里网格,网格长先调,第二道镇里行业、综治再调,第三道人民法庭或调或裁。

2018年初,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法院全面推广永康“龙山经验”,法庭总数从2017年的243个增至目前的338个,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诉源治理“桥头堡”功能,积极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大力推动人民法庭从过去单一“注重办案”向“参与治理”并重转变。

统计显示,2022年全省55%的人民法庭实现收案负增长,带动全省法院民商事案件收案下降3.6%,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从化讼止争向少讼无讼转变。

段也越发隐秘,施建国辖区内就有两名律师因为轻信“天上掉馅饼”的投资理财类诈骗损失了几十万元。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频发的状况,施建国定期邀请辖区单位人员召开反诈宣传会议,在小区、楼宇内进行“扫楼”反诈宣传。施建国还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联络员建起联络群,定时推送反诈宣传资料,诈骗案件大幅下降。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其实社区民警日常接触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一些可能我们到达现场后两句矛盾就解决了,在我们看来这些都不算什么成绩。”施建国总是这样说。

然而在施建国带的新徒弟李星熠眼里,可不是这么回事:“师傅总是很有耐心,我手上事情多了不知该从何下手时,想想师傅是怎么干的就会沉下心来慢慢去做。”

李星熠之前接到一个父亲打女儿的家暴警情,登门了解情况时发现父亲孙某态度嚣张。尚未成家,社会经验稍显不足的李星熠不知从何处介入,于是向施建国求助。

施建国上门后,面对孙某的嚣张态度,毫不退让。他明确告知孙某殴打他人是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处以拘留。

接着,施建国又从情感上劝说孙某,跟他讲自己办过案件中真实的故事,让他别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却让孩子性格产生缺陷,日后在学习工作乃至择偶中出现更多问题。这之后,李星熠再也没接到这户人家的相关警情。

“看到他努力的样子,好像又看到了自己当年刚当警察的样子。”施建国感慨道,李星熠在社区当民警之外还承担了所里的反诈宣传工作,今年3月他与辅警周凡涛自编自导的反诈短剧《满江红之反诈》在全省“平安亚运全民反诈——反诈达人秀(杭州)”公益活动中获评一等奖。

北山派出所所长风素芳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施建国与李星熠这样优秀的民警与年轻民警结成师徒对子,不仅产生了丰富经验与年轻活力间的化学反应,更助力北山派出所守好红色根脉、赓续红色基因,民警们在忠诚履职担当中写好红色家谱,守好红色阵地,当好红色传人,传承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最美“枫景”。

在党的领导下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诉源治理是“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

在浙江,法院收案数量逐年稳步下降,诉源治理走在全国前列。统计显示,2018年浙江法院收案增幅由2017年的14.8%下降至3.4%,系10年来首次出现个数增长;2019年收案下降4.6%,系全国唯一收案下降的省份,此后逐年稳步下降,2022年收案下降10.1%,收案数从过去的全国第2位降至2022年底第8位。

这背后,是一套诉源治理的“组合拳”:2018年起分别在乡镇、县级和全省层面总结推广永康“龙山经验”、舟山“普陀模式”和“浙江解纷码”,积极推动“信访打头、调解为基、诉讼断后”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建设,构建起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最大限度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

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村民世代习武,加之地理位置处于三区交界,容易产生各种矛盾。

“村干部在调解个案纠纷过程中,遇到疑难复杂问题,只懂情理,不懂法理。”上田村党总支书记潘曙龙说,作为特邀调解员,潘曙龙的多元共治想法与临安区人民法院不谋而合,逐步演化出了共享法庭。

潘曙龙告诉记者:“有了共享法庭,我们

可以向法院提出指导调解的申请

可以向法院提出指导调解的申请,由法官给予专业法律解答,改变以往村干部处理纠纷时只讲摆平,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困境,让村干部在调解过程中更有底气、信心更足。真正将村干部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与法官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杭州中院共享法庭建设工作专班负责人陈辽敏看来,共享法庭像一个小支点,撬动了社会治理的大格局。

从上田村出发,这一“不增编、不建房,一根网线一块屏”的机制已经推广至浙江。截至目前,浙江省已建成共享法庭2.7万个,覆盖100%的镇街,98%以上的村社,指导调解40.17万次,化解矛盾纠纷30.83万件,纠纷就地化解率为76.75%,普法宣传9.5万场464万余人次。

6月27日,《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浙江省地方标准发布,深入推动共享法庭规范化、均衡化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普惠、均等的法治服务。

在数字改革中探索整体智治模式

“杜法官,今年市场上假茶少了,我们安吉白茶更好卖了!”今年4月,春茶销售旺季,一起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向时任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杜前感慨道。

司法守护着安吉白茶,也守护着茂林修竹。审判环节已是环境资源案件的末端,如何从前端发力,从“事后解”到“事前防”,实现环境司法“治未病”,也是浙江法院逐步探索的新领域。

在湖州安吉,120名“森林法官”的身影活跃在215个行政村,他们力量下沉为的是提前介入涉林案件化解。

“‘森林法官’就是我们老百姓取的名字。”安吉县溪龙乡农业农村办公室四级调研员钱义荣说,“我一辈子跟茶叶、茶农打交道,

在这过程中跟法院接触也比较多

在这过程中跟法院接触也比较多,法院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特别是白茶季,法官还驻点在茶山、白茶交易市场提供法律服务,非常及时、方便。”

走进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这里像是一个化解纠纷版本的政务大厅。记者在立案导诉窗口碰到来办业务的本地律师裘述,他说:“我们一般希望能诉前调解,案结事了最好,共享法庭像一个小支点,撬动了社会治理的大格局。”

杜前介绍:“我们率先在全省出台人民法院参与诉调中心建设规范化指引,全市基层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建制整体入驻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在全省率先发布‘诉源治理指标体系’,将纠纷诉前调解成功率等核心指标纳入对乡镇的平安考核。”

如今,浙江省90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入驻中心,法院剥离诉前调解职能,法官不再直接参与纠纷调解,而是专注于调解指导、司法确认、诉调对接、简案速裁等工作。

2022年,全省社会治理中心接待群众113.7万人,统一受理各类信访和矛盾纠纷66.5万件,办结61.7万件,化解成功率达92.8%。

与此同时,浙江省层面大力推广“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打造“资源集聚、分层递进、智能解纷”的省域纠纷解决模式。

截至今年6月,“浙江解纷码”访问量达1545.2万人次,提供智能咨询925万次,调解案件307.9万件,调解成功率为51.1%,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在法治轨道上完善分层过滤体系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实现法治之下的

和谱和谐?

和谱和谐?

记者注意到,“党委统揽、关口前移、一站解纷”的县域纠纷解决模式体现出浙江法院在基层治理上的智慧。

近日,诸暨市新增了一个“和睦家事”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早在2021年,诸暨法院就推出婚前科普学习教育平台,帮助新人以更理性审慎的态度对待婚姻生活,从源头上减少婚姻家庭纠纷,推进家事审判方式改革。

“治理越早,化解纠纷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等越小,这显然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理念完全相同。”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刘艳认为,矛盾纠纷全生命周期治理就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位于金华永康龙山镇桥下南村的龙山人民法庭,下辖龙山、西溪两个乡镇,辖区总人口超10万人。这里经济发展起步早,市场化程度高,外来务工人员多。两名法官,一名法官助理加两名书记员,小小的法庭如何应对多发的矛盾纠纷?

龙山人民法庭主动对接乡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纠纷统一由中心指挥分流,第一道村里网格,网格长先调,第二道镇里行业、综治再调,第三道人民法庭或调或裁。

2018年初,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法院全面推广永康“龙山经验”,法庭总数从2017年的243个增至目前的338个,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诉源治理“桥头堡”功能,积极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大力推动人民法庭从过去单一“注重办案”向“参与治理”并重转变。

统计显示,2022年全省55%的人民法庭实现收案负增长,带动全省法院民商事案件收案下降3.6%,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从化讼止争向少讼无讼转变。

关注·筑牢反诈防线



福州鼓楼警方打击电信诈骗实现“两降两升”

本报讯 记者王莹 记者近日从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获悉,今年以来,鼓楼警方坚持围绕“打得了、防得住、追得回”目标要求,最大限度控发案、破破案、降案损。截至今年5月,鼓楼区共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211起,同比下降6.0%;破案率为56.6%,同比上升15.7%;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668人,同比上升58.7%,财产损失同比下降37.2%,实现了立案数下降,群众损失数下降,破案数上升,抓获犯罪嫌疑人人数上升的“两降两升”工作目标。

鼓楼警方坚持打防并举,紧密依托“e体+”智慧赋能数字侦查体系,常态化开展“断卡”“断流”“扫楼”等行动,不断挤压违法犯罪嫌疑人生存空间,今年以来,全区共抓获涉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668名,打掉辖区内外涉诈骗窝点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0余人,累计为群众追赃挽损800余万元。

图① 7月5日,江西省横峰县人民法院组织法官来到千亩荷花园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为群众讲解防诈骗技巧,守好群众“钱袋子”。图为法官向游客发放反诈宣传资料。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薛南 邱建 摄

图②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洪泽分局抽调机关民警利用周末支援基层派出所开展预防诈骗宣传,提醒居民注意保护财产安全,图为民警向居民宣传应对诈骗方法。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陈一群 摄

图③ 7月4日,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东港派出所反诈流动宣传车开进夜市街,向过往群众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守牢群众“钱袋子”。图为民警在夜市开展反诈宣传。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刘鑫 杨攀峰 摄

整合资源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上海二中院成立基层治理工作室联盟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黄浩栋 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党建引领 绿法善治”基层治理工作室联盟成立活动,6家基层法官工作室、街道办事处、律师事务所联合成立工作室联盟,通过共建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据了解,联盟将发挥好党建引领重要作用,通过开展理论联学、党课宣讲等活动,以组织融合带动发展融合,以组织共建引领发展共建,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引领区域发展、创新基层治理、更好服务群众的实践效能。

联盟将在属地区域或业务领域建立社情民意采集点,收集基层治理中遇到的热点法律问题和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法律服务需求,梳理形成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的专业力量资源清单、基层法治需求清单和联盟服务保障项目清单等“三张清单”,并通过建立常态工作例会机制、基层治理响应机制、矛盾调处指导机制、项目清单管理机制、治理事务研讨机制,实现供需对接,深化诉源治理。

联盟发起人、上海二中院立案庭副庭长、乔法官工作室负责人乔蓓华说,联盟的成立充分整合了来自人民法院、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力量,从而实现政治理论联学、阵地资源联享、诉源治理联动、特色品牌联创的“四联”工作模式。

上海二中院党组书记、院长郭伟清表示,分则独当一面,合则众志成城,联盟的成立是为了能够发掘和吸收更多志同道合的成员加入,在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法律服务等领域形成更多开拓性成果,共同答好基层治理这道“必答题”。

项目清单管理机制、治理事务研讨机制

项目清单管理机制、治理事务研讨机制,实现供需对接,深化诉源治理。

联盟发起人、上海二中院立案庭副庭长、乔法官工作室负责人乔蓓华说,联盟的成立充分整合了来自人民法院、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力量,从而实现政治理论联学、阵地资源联享、诉源治理联动、特色品牌联创的“四联”工作模式。

上海二中院党组书记、院长郭伟清表示,分则独当一面,合则众志成城,联盟的成立是为了能够发掘和吸收更多志同道合的成员加入,在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法律服务等领域形成更多开拓性成果,共同答好基层治理这道“必答题”。

智慧检察守护临澧水生态安全

智慧检察守护临澧水生态安全

本报讯 记者师标 通讯员周芝华 何卫华 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县人民法院等部门,在该县水道河国家湿地公园开展“留住一片湿地 传承一代文化”监督巡护和普法宣传活动。

据介绍,沅沙水库是临澧县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之一,2018年底,群众反映水库水质差已呈黑绿色,后经检测为水质Ⅳ类。该院随即联合各部门开展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工作,并提出检察建议,组织巡查队伍和远程监控配合加强对水源地质监测,利用科技手段全方位参与整改。目前,沅沙水库恢复了水清岸绿的状态,确保了县城区和附近乡村用水安全。